

从“改进农作法”到“精耕细作”

——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精耕细作”提法的由来

曾雄生

内容提要:成语“精耕细作”是对中国古老农作法最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这一特征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以后一直存留在千百年来农民的实践之中,但作为一句成语则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才开始流行,而它的形成又与当时中共领导的延安大生产运动,特别是在运动中被树立为典型的劳动英雄吴满有等模范人物有关。吴满有等人通过“改进农作法”,提高产量,支援边区建设,经过媒体报道,其经验被总结为“深耕”、“深耕细锄”或“深耕细作”,而后这些语汇又可能是受到国统区传入的“精耕”一词的影响,最终在 1943 年底及 1944 年定型为“精耕细作”,并且在 1957 年经毛泽东的再次提及之后,受到广泛的重视,成为新中国农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它的使用及影响也已超出农业之外。本文采用概念史的方法,对这一成语的形成过程,对精耕细作的内涵、技术特点及其在棉花生产中的运用进行了梳理,以期对人们经常说到的这一成语有一个更深入完整的理解。

关键词:精耕细作 延安大生产运动 吴满有 毛泽东 大跃进

精耕细作是现代人对中国传统农业精华的一种概括,指的是传统农业的一项综合技术体系。这一技术体系是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包括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农业生物生产能力的一系列技术措施。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内涵,我国农业精耕细作传统的发生与发展,乃至精耕细作农业传统的现代意义多有论述,^①但却没有对“精耕细作”这一成语的形成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有的只是简单地说,“精耕细作”这个词古代没有,是近代才出现的。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中共的文件中采用了它。^②那么,“精耕细作”一词的最早使用是在什么时候?它的内涵是什么?“精耕细作”一词最初使用时又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围绕着上述问题,笔者对“精耕细作”一词的早期使用情况进行初步考证。

按照现有说法,该成语的出处是 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讲话中提到:“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③同一讲话中两次提到“精耕细作”,可见毛泽东对精耕细作的重视。但这并不是这个成语的最早出处。文献数字化产品很容易帮助我们查找某一词语的早期使用情况。就“精耕细作”这一成语而言,1946 年 6 月 15 日的《人民日报》第 2 版就在一篇题为《晋绥节余劳力用于副业生产》的报道中使用了这一成语,该文提到“兴、临等县将节余劳力用于大量制造肥料,加强精耕细作,预计每垧地可增产粮九升。”从这篇报道开始,到 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讲话以前,《人民日报》共有 588 篇报道中用到了“精耕细作”一词,而在这 588 篇报道中,以“精

[作者简介] 曾雄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90。

① 万国鼎:《中国农业精耕细作传统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新华日报》1961 年 7 月 22 日,第 3 版,转引自《万国鼎文集》,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8 页。

② 李根蟠:《精耕细作三题》,《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 年第 4 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30 页。

耕细作”为标题的报道就有25篇。此外,在1957年以前还出版了以“精耕细作”为书名的著作。^① 显见自1946年以后,“精耕细作”已成为一个常用成语。1957年前10年的1947年,仅《人民日报》就提到41次。但这些还不是“精耕细作”最早的出处。继续搜寻发现,“精耕细作”一词可能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随着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一道流行起来的。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根据地的财政发生了极大的困难。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②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普遍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精耕细作”是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流行起来的一个词语。而这个词的流行还可能与当时的劳动模范吴满有等劳动英雄的先进事迹有关。确切地说,“精耕细作”是对以吴满有为代表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的总结,同时也受到古法的影响,并与来自国民政府的宣传有关。

一、劳动英雄吴满有与精耕细作

吴满有(1893—1959),陕西横山人。1928年因逃避灾荒,移居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吴家枣园。在此以前,他没有土地,是个佃农。1935年土地革命后分得一座荒山。因善于经营、吃苦耐劳,成为吃穿不愁的富裕农民。1936年,打粮11石,送交公粮2石;1937年,打粮17石,送交公粮5石;1938年,打粮20石,送交公粮8石。他还养牛2头、马1匹、驴1头、羊50只。1941年,吴满有一家开荒种地33垧,^③秋收时节,打粮34石,送交公粮14.3石、公草1000斤,购买公债150元、公盐代金665元。这在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是非常了不起的义举,因而也引起了注意。

怎样才能多打粮食?这正是当时延安抗日根据地普遍关心的问题。1942年初,在延安县各区长检查春耕联席会上,柳林区区长尹登高介绍了吴满有的事迹,说他“地种得多,荒开得多,粮打得多,缴公粮踊跃争先,数量既多,质量又好,是一个抗属,模范的农村劳动英雄。”旁听会议的《解放日报》记者抓住了这个新闻线索,专程到距离延安约30公里的吴家枣园采访吴满有。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头版首次对吴满有的事迹进行了报道,题为《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影响群众积极春耕》。报道以通俗的语言介绍了吴满有“比别人多打粮六分之一”的经验,同时编发社论,号召“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接着该报又在5月5日的第1版、第2版和5月6日的第1版及10月29日的第2版对吴满有进行了报道。其中5月6日《解放日报》第1版就刊登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的通令,“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

《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引起了解放区领导人朱德和毛泽东等人关注。1942年5月23日,朱德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发言时说,《解放日报》发表关于吴满有的新闻报道,其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救国公粮,相当于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的总数。^④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讲话。讲话中多次提到吴满有,并肯定了对劳动英雄的奖励政策在边区农业发展中的作用。他举例说,“延安的吴满有、卯克呼,甘泉的杜发福,都是经过第一次农展会奖励过的,他们现在都成了很好的富农。”^⑤毛泽东建议,“由建厅及

① 罗珂著:《张富贵精耕细作》,华东新华书店胶东分店1949年版,出版地点不详;山东省实业厅、山东省教育厅编:《精耕细作》,济南:山东新华书店1950年版。

②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灵寿陈庄镇: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2年版,第3页。

③ 垧,面积单位。每垧合3亩,约2000平方米。

④ 莫艾:《吴满有在大生产运动中》,艾克恩主编:《延安记者》,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76—477页。

⑤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页。

五个专署筹划,在一九四三年夏冬两季,五区分别举行五个展览会。根据边区两次农展经验,改善农展布置,介绍与奖励农民模范成绩,推广吴满有式的勤劳与得法的农业生产运动。”“一九四三年应大大提倡吴满有式的生产运动,使在五个区域内产生很多的吴满有。”^①

毛泽东之所以推荐大家学习吴满有,争做吴满有,是因为他觉得吴满有代表了边区农业生产发展的方向。毛泽东在总结农业发展的主要教训时,提出“要因时制宜”,“要依据各种不同地区而采取不同方法,一种地区以深耕为主,另一种地区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在时间上也要有分别:在有荒地可开时,以奖励开荒为主;在荒地开尽时,就要转为以奖励深耕为主了。”^②这两种增产办法(即深耕和开荒),在吴满有身上都得到体现,即他的“勤劳和得法”。在吴满有的事迹得到解放区领导人的肯定之后,《解放日报》1943年1月11日第1版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号召全体边区农民开展“吴满有运动”,“向吴满有看齐”,大力开荒生产,提出了“吴满有方向”。此后吴满有更成为各种宣传报道和艺术创作的热门人物,还被拍成了电影。《解放日报》1943年3月9日第4版刊载了艾青的长诗《吴满有》。吴满有的画像和朱德、毛泽东共悬壁上。^③还出现了“吴满有”牌香烟。吴满有因此在边区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担任过边区参议员、延安南枣园乡乡长等职务。

在1943年开展的生产竞赛中,吴满有和他所在的吴家枣园村,表现神勇,共上交粮食27石,而吴满有一人就主动缴粮12石,荣居榜首,被选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1943年11月26日到12月26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在延安同时举行。1943年11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宴请了吴满有等185名与会的劳动英雄,并作了著名的《组织起来》的讲话。同一天,吴满有等4位劳动英雄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很好地总结生产经验,再详细地订出明年的生产计划。12月9日,毛泽东又仔细地参观了生产展览会,并专门找了吴满有、申长林、孙万福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了生产经验。

就在这次大会结束不久,人们在欢度1944年春节之时,吴满有于正月初十,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要多开4垧荒地,为毛泽东代耕2石细粮(当时边区政府所有人都有耕地或者织布任务),希望毛泽东能集中精力去谋划全国的工作,不要为了生产消耗力量。^④毛泽东接受了吴满有的请求。此后,吴满有每年都把收获最早最好的一石麦子和一石小米,亲自送到中央办公厅。

当初,吴满有的事迹见诸报端后,因其有雇工行为,即“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拦羊娃,农忙时还雇短工”,属于富农,引发争议。读者赵长远就在1943年2月2日向《解放日报》投书,提出“能不能把富农的方向(吴满有的方向)当做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等问题。编辑部在3月10日回复了赵长远“关于吴满有的方向”的问题,并刊登在《解放日报》1943年3月15日第1版和第2版,回复中肯定了吴满有方向,认为“这种方向,就是要全边区农民都能努力劳动发展生产,使雇农升为贫农,贫农升为中农,中农升为富农,虽然不会有多数农民升为富农,但会比现在有更多的农民上升却是无问题的,是必然的,必要的,对边区经济发展与革命发展有利无害的。”但这个回复似乎并没有消除人们的疑虑,因为雇工毕竟是剥削行为,这和土地革命的宗旨多少是有些背离的。所以到了1944年以后,对于吴满有的宣传稍有变化。1944年12月5日邓小平在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上讲话,肯定了吴满有方向,并将吴满有方向与“精耕细作”联系起来。讲话中提到:

我们实行彻底减租、扶助贫农生产、组织起来、劳动互助、公私兼顾、精耕细作、多耕多锄、多上粪,就是实行吴满有方向,就是实行贫的变富,富的更富的方向。^⑤

①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页。

②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16页。

③ 张仙洲:《我是劳动英雄》,《申报》1948年7月3日,第5版。

④ 《吴满有同志为毛主席代耕》,《解放日报》1944年2月11日,第1版。

⑤ 邓小平:《在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新华日报(太行版)》1944年12月25日,第1版。

吴满有成为精耕细作的代表,“吴满有的方向”就是精耕细作的方向。组织起来,开展吴满有方向,首要的政策便是“精耕细作”。^①这也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内容。^②土地改革中对富农及中农的政策,不是消灭富农,而是“发展吴满有式的富农”。至于帮助贫农升为中农问题,则“主要从普遍的发展精耕细作,手工业副业生产中(如发放农贷,组织劳动互助及合作等等)去逐渐解决。”^③向吴满有学习,开展吴满有运动,变成了对精耕细作的提倡。

精耕细作也是吴满有最为得意之处,尽管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他未必能用这四个字对他的经验进行总结,但他勤劳肯干,农活做得好是不争的事实。1944年进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冈瑟·斯坦(Gunther Stein)也对吴满有进行了专访。在回答是怎样成为劳动英雄的问题时,吴满有说:

1941年,毛泽东同志要求人们在农民中发现一些模范农民,作为第一批劳动英雄的候选人。人们四处打听,就把我选出来作为候选人之一。县长也知道我努力工作,并且在政治上忠诚新民主主义。1942年的一天,召开了一次大会,我们区里的人选了我。他们提出了几点理由:我耕作的方法比别人更加精细(My methods of cultivation were more intensive than those of the others);我在当时所有的20至25亩(笔者注:垧?)地上,除草比别人勤,用功比别人多;我还饲养了两头牛,这对于贫苦农民来说,是很不平常的。^④

1948年,吴满有被俘后,在西安接受《申报》记者的采访时,再次提到自己成为劳动英雄和成名的经过,他说:

咱的庄稼做得细致些,他们都说咱会生产。四一年边区要选举劳动英雄,层层调查,报到上面去。我是第一。四二年五月一日,我当了劳动英雄,当时咱还害怕,不知道劳动英雄是弄啥哩,后来开了欢迎会,全边区共有五个人当选英雄。我是头一名。边区政府给咱赏了一个镢头、两个锄,我收下了,回去还是咱个庄稼,努力增产。^⑤

二、“精耕细作”一词的产生和流行

1939年2月2日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李富春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提到“劳动力强的人深耕、开荒;劳动力弱的人施肥、除草。”他动员边区民众在春耕运动中,要做到“改良耕种方法——深耕,施肥,除草。”“所有原有耕地都要进行深耕;……所有新开的荒地,都要翻两次土;但开荒的地方,也不停止深耕。不管深耕或开荒,都要多加肥料,勤于除草,这样,才能够增加土地的生产力。”^⑥1940年,谢觉哉、左健之在《关于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我们过去注意耕地的扩大,但对于怎样增加每亩(或每垧)土地的收获量这个问题却注意不够。即是说,对于改进农业技术以帮助贫农、中农的发展这方面做得不够。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应广泛的修筑水利、提倡深耕、选择与改良种子、改进农具等等,以提高农业的收获量。”^⑦

两年后,毛泽东之所以推荐大家学习吴满有,争做吴满有,是因为他觉得吴满有代表了边区农业生产发展的方向,即“要因地因时制宜”发展农业。但当时毛泽东并没有使用“精耕细作”来概括吴满有的经验,吴满有本人在回答中外记者时的讲话,几经转述,自然不能当作是“精耕细作”一词的最早出处。在“开展吴满有运动”以前,吴满有的经验更多的只是与“深耕”“多施肥”“多锄”“耕种适时”

① 宋劭文:《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资料选编》第1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786页。

② 范任卿:《全村组织起来精耕细作 南村平均达耕二余一》,《人民日报》1946年10月24日,第2版。

③ 冀热辽分局《重要电讯》第17期第0038号(1947年4月),转引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冀东土地制度改革》,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④ G.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New York: McGraw-Hill, 1945, p. 159.

⑤ 张仙洲:《我是劳动英雄》,《申报》第7卷(1948年7月3日),第5版。

⑥ 李富春:《加紧生产,坚持抗战》,《解放》(周刊)第65期(1939年2月28日)。

⑦ 谢觉哉、左健之:《关于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解放》(周刊)第119期(1940年11月16日)。

等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号召的也只是推广这种“吴满有式的勤劳和得法的农业生产运动”，而所谓“得法”便是以“深耕”为代表的“改良作法”，不合深耕的作法便是“作法粗”。^① 1942年12月5日边区政府发布的《一九四二年经济建设工作报告》也只是提到：“为提高原有耕地之粮食产量，动员人民进行深耕、锄草等改良作法。”据此，在1942年底以前，只有“深耕”二字，似乎没有出现“精耕细作”这四个字，尽管这四个字所包含的内容都有了。一年后，“深耕”的说法就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1943年12月2日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关于四三年发展农业生产的指示信》提出：

提高农业产量，一面要努力开荒扩大耕地面积，一面提倡精耕施肥，提高质量，哪一方面为主，哪一方面为辅，扩大到多少。精耕到什么程度（耕多深，锄几次，上粪若干，技术怎样改良），必须因地制宜，各县订出具体计划。大体上如兴县、岢岚、临北部份仍可大量开荒，临南、保德、河曲，人稠地少，着重精耕细作，可能时向地广区域有计划的移民。……同一个县的各个区，各个村条件又不完全相同，故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②

这封指示信大意上跟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即发展农业“要因地因时制宜”，但值得注意的是用“精耕”代替了“深耕”，而“精耕”的内容仍然是和“深耕”差不多。

用“精耕”取代“深耕”并非偶然。“精耕耨”之说见于清代。清康熙《邹县志》载，“精耕耨，巧捆织，善栽种，勤牧养，以自食其力。”^③清末翻译的国外农书中也使用了“精耕”一词，如一本《栽培各论》的书中提到，大豆“栽培之地不必精耕，恐徒使茎叶盛长，结实不良。”蚕豆“其植地较他豆需精耕周耘，施肥较大小豆亦须多。”^④1937年抗战爆发前，国统区江苏省就进行了区田栽培小麦的增产试验，1939年浙江省也试行稻作区田栽培。这些被称为“精耕”增产方法，也受到了高层的注意，1941年，蒋介石曾通令各省采择试验仿行。当年浙江省就提出推进“区田区田的精耕运动”。^⑤ 这项运动也在其他省区得到宣传和推广。如，1943年8月29日出版的《陕西省政府公报》（第866期）就提到“古法精耕，增加产量”；^⑥1944年1月出刊的《广西企业季刊》也对“推行精耕，增加农产”进行介绍。^⑦ “精耕”一词也可能藉此由国统区进入解放区。

然而，即便是“精耕”一词已然流行，仍然存在“精耕”与“深耕”混用的现象。如，1944年2月10日，高自立在《边区植棉发展概况及今后推广方向》一文中，认为边区植棉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偏重了推广棉地面积，对于深耕细作，以求产量的提高就很少注意。”指示东三县“一般不应再推广面积，只在去年的面积上深耕细作，提高产量。”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在《边区改良农作问题》中使用的也是“深耕细锄”和“深耕细作”。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关于四三年发展农业生产的指示信”虽然用到了“精耕”二字，但仍然落实到“深耕多锄多上粪”上面。《人民日报》1946年10月24日第2版的报道中，标题中用的是“精耕细作”，而正文中用的是“深耕细作”。^⑧

“深耕”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中国古代对于植物生长有个基本的认知，这就是“根深叶茂”，为了追求根深，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深耕。先秦诸子对“深耕”就多有提及。例如，《国语·齐语》：“深耕而疾耨”；《管子·小匡》：“深耕、均种、疾耨”；《庄子·则阳》：“深其耕而熟耨之”；《孟子·梁惠王上》：“深耕易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耕者且深，耨者熟耘”等。自战国时

①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16页。

② 转引自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③ 康熙《邹县志》卷3《风俗》。

④ [清]杨巩：《中外农学合编》卷2《农类谷种》，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第3、7页。

⑤ 黄明：《区田区田的精耕运动》，《乡建通讯》1941年第11—12期。

⑥ 《本周大事记》，《陕西省政府公报》第866期（1943年）。

⑦ 《经济要闻》，《广西企业季刊》第2卷第1期（1944年）。

⑧ 范任卿：《全村组织起来精耕细作 南村平均达耕二亩一》，《人民日报》1946年10月24日，第2版。

期提出“深耕”的口号以后,经过秦汉一直到明清,人们对深耕的强调丝毫没有减弱,相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以翻土的深度而言,很早就有以尺寸为计量单位的量化标准。如宋人提到湖南南部的桂阳,其民“拙而惰,耕器绝苦窳,耕刃入土才三、四寸。”^①显然这三、四寸的入土深度在宋人看来是很浅的。明代马一龙《农说》提出的深耕标准是“三寸为浅,九寸为深”,实际上明清时期的深耕标准是一尺左右。明代沈氏则用铁塔“二三层起深”,据说其深度可达到一尺左右,湖州僧人则“先用人耕,继用牛耕,大率深至八寸”。^②而在此之前,南宋陆九渊家治田“每用长大镢头,两次锄至二尺许。”^③清代潘曾沂《区种法》中提到:“田要翻得深,垦得碎,耙得细。又要通身周遍,不许一处不深,不许留一块细实粗泥。深到二尺外头,又极松细;苗根直生向下,着土必牢,行根周身适意,不怕不好。”^④而河南扶沟县则利用“挑深数尺,或多牛深耕,可翻换好土。”^⑤于此可见,深耕之法由来已久。李富春在《论生产运动》一文中说,“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是有着许多的困难的,首先因为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之区,无工商业的必要基础,农业的耕种还是老的方法,无科学的技术基础。”^⑥“深耕”便是老的方法。边区便有“多耕深耕,地里出黄金”的农谚。^⑦

1942年,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虽然仍旧沿用“深耕”这一概念,但内涵上却发生了一些变化。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深耕”这种“改良作法”就包括“多锄草、多施肥、多犁地”。1944年中共西北局调查研究室在《陕甘宁边区改良农作问题》中指出,改良农作法,主要包括耕地、施肥、锄草、选种、修改地形等。文中继续采用“深耕”的概念,指出“深耕的第一个要求便是多耕”,“深耕的第二个要求是犁得深”,“深耕的第三个要求是细耕、细磨、细打。”^⑧但这些内涵又岂止一个“深”字了得?因为深耕除了表示“犁得深”外,很难与“多耕”与“细耕”等联系起来,于是就用“精耕”取代“深耕”。一字之差,意思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但“精耕”仍然没有办法涵盖以“深耕”为代表的“改良作法”所包括的“多锄草、多施肥、多犁地”等内容,因为狭义上的“耕”,通常指的是播种前的整地,而不包含播种后的中耕除草及田间管理等项内容。汉代人为准确地概括农业技术的内涵,在先秦“深耕疾耨”“深耕熟耨”“深耕易耨”“深耕熟耘”等的基础上,又发展出“深耕细锄”的说法。东汉王充《论衡》有言:

夫肥沃饶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树稼丰茂;饶而埆者性恶,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⑨

汉代以后,“深耕细锄”一词一直在沿用,成为“精耕细作”的重要原型。如,1918年3月14日的《申报》在介绍萝卜的种植方法时提到:“经四次之深耕细锄,萝卜发生之后,自得任意蔓延。”^⑩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的《边区改良农作问题》既使用了“深耕细作”一词,同时也使用了“深耕细锄”一词。在已有“深耕细锄”的基础上,随着“精耕”一词的出现,由二者组合而成的“深耕细作”“精耕细作”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先是“深耕细锄”变成了“深耕细作”。1943年2月7日,陕西省绥德县张家砭乡郝家桥开了村民大会,订出十条村民公约。公约第四条:“要按时耕种,牢记深耕细作,要有草就锄,定必多锄匀

① [宋]陈傅良:《止斋文集》卷41《跋灵润庙赐敕额》,四部丛刊初编本,第8a页。

② [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③ [宋]陆九渊著:《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4页。

④ 王毓瑚辑:《区种十种》,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115页。

⑤ 道光《扶沟县志》卷7《风土》。

⑥ 李富春:《论生产运动》,《新中华报》1939年3月3日,第4版。

⑦ 康敏:《整地和施肥——边区农谚研究资料之二》,《解放日报》1945年3月26日,第4版。

⑧ 中共西北局调查研究室:《陕甘宁边区改良农作问题》,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65—67页。

⑨ [汉]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3页。

⑩ 《申报》1918年3月14日,第13版。

锄。”这是已查到的“深耕细作”一词的最早出处。但这条公约出现在媒体上却是《解放日报》1944年2月21日第4版,该报在题为《刘玉厚与郝家桥》的报道中,还提到模范乡的乡民公约,还有“学习刘玉厚努力生产、按时耕作,早起晚回、多打粮食;学习王德祥的深耕细作”一条。比之更早出现在媒体报道的则是1943年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多开荒地,深耕细作,增修水利,发展副业。”^①《解放日报》1944年1月1日第2版在题为《吴满有和吴家枣园》的报道中,介绍了吴满有1943年的生产成绩,肯定“这在延安县南区还有荒地可开的条件下,以开荒为主而以深耕细作为副的办法完全是对的。”接着又出现了“勤锄细作”一词。1944年1月6日《解放日报》第2版在题为《妇女农业劳动英雄郭风英》的报道中写道,“去年在她的勤锄细作下,共收了五石九斗四升粮食,二百五十个瓜,十六袋洋芋,过着很不差的生活。”1944年12月,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召开了第一届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大会提出了十大号召,其中之一便是“深耕细作,兴修水利,整理土地。”

最后是“深耕细作”变成“精耕细作”。1943年12月2日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关于四三年发展农业生产的指示信》用到了“精耕细作”一词。1944年5月14日,中共米脂县委所作的《米脂县一九四四年春耕变工总结报告》中认为,变工的作用之一便是“能作到不误农时和精耕细作。”^②1944年12月《米脂吕家峪今后固定减租办法》在提到固定减租的好处时,说“订定租约时,每垧地常年产量为五斗,后经施肥、溜崖、拍畔,深耕细作,增加产量一斗或二斗,属于佃方所有,地主不得干涉。”^③“为了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并使农民愿意在土地上多投资金劳力来精耕细作起见,减租减息就成为必要。”^④12月5日,林伯渠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了大生产运动中农业生产所存在的缺点,“这就是偏重数量(如开荒、锄草等)不讲求精耕细作的倾向。今后必须努力纠正这种偏向,普遍倡行精耕细作,以提高质量。”^⑤同年,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的劳动互助》提出,“在地少人多的地区开展劳动互助,可以节省劳力,实行精耕细作和发展副业。”^⑥1944年12月27日《解放日报》在第1版和第2版报道“边区展览会开幕各项建设大有进步”时,提到“党和政府为了在实现耕三余一运动中,曾执行各种具体政策及办法:精耕细作、增开荒地、组织起来、推广植棉、消灭病虫害、增发农货、推广水利及减租减息。”

由“深耕”经“深耕细锄”“深耕细作”,再发展为“精耕细作”,最大的变化是加入了“精”字。强调“精”,除了是农业生产的需要以外,也可能与当时整个工作方法上的转变有关。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提出实行精兵主义。随后,党外人士李鼎铭等人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建议“实行精兵简政主义”,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精”字也开始出现在其他的一些场合。在1942年的文献中发现,“精细”用于修饰耕作农具。如对绥(德)、米(脂)所用农具的调查发现,“与老边区比较要精细、进步一些。”^⑦与“精益求精”相反的“粗枝大叶”受到批判。1944年12月5日,林伯渠在题为《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批评了“工作中的重量不重质倾向”,指出“在工作方法上,有许多工作人员至今只习惯于粗枝大叶的方式,

①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解放日报》1943年12月17日,第1版。

② 中共米脂县委:《米脂县一九四四年春耕变工总结报告》,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0页。

③ 《米脂吕家峪今后固定减租办法》,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第293页。

④ 《陕甘宁边区农业》(可能是1945年文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第346页。

⑤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2页。

⑥ 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的劳动互助》,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第503页。

⑦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

不习惯于细法方式。可是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一种细法工作,建设工作愈发展,愈提高,就愈是需要具体的和细法的领导,愈不能采用粗枝大叶的方式和简单命令的方式。”^①参议会决议肯定了林伯渠的报告,指出:“在今后两年之内,尤应本既定方针,坚持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提倡精耕细作。”^②

1944年以后,“精耕细作”一词显然不仅出现在陕甘宁边区,在其他边区也都有使用。1944年12月20日至1945年1月30日,晋察冀边区举行第二届群英大会。大会总结了1944年的大生产运动,具体布置了1945年的大生产运动,提出了“组织起来”,“精耕细作”,争取做到“耕三余一”号召。^③晋绥边区制订的一九四四年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条件中有专门的一项是关于“精耕细作劳动英雄条件”。^④

“精耕细作”成了“农民的口号”,^⑤也成了不少社会调查报告、纪实作品和文艺作品中的主要内容。^⑥社会调查将“精耕细作”作为农民致富的因素,认为精耕细作成为贫农、中农上升的最主要原因。^⑦宣传报道中,也有类似“由于精耕细作产量已大大提高”这类的报告。^⑧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还出现了“实行精耕细作,扩大耕地面积,争取耕三余一”,^⑨“填平补齐辞旧岁,精耕细作迎新年”^⑩和“精耕细作多打粮,兵强马壮打东洋”^⑪这样的标语、对联和顺口溜等。

1944年以后,“精耕细作”作为一个流行词已广泛使用并深入人心。因此,在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刘建章等二人在提倡改良农作法案时,原办法第一项内之“深耕浅种”,经审查改为“精耕细作”,“以适应边区一般情况”,“余照原案通过,交政府办理。”^⑫在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报道《记边区人民的民主团结大会——第三届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经过概述》中,也提到了“在财经方面有改进税收工作、精耕细作、改良农作法,提高技术,组织劳动,发展边区农业工作,发展交通改良道路等案。”^⑬1946年4月,薛暮桥在《减租减息与发展生产》中指出:“三四年来,我们在解放区乡村中做的减租减息、发展生产两件大事,已经收到显著成绩,凡是减租减息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普遍彻底且能掌握政策,群众生产情绪已经大大提高,互助合作精耕细作已经普遍开展。”^⑭1947年1月10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财经工作的决定指出,“广泛推进吴满有生产运动”,“今年大生产中的水利、防灾、精耕细作、合作等问题,边区另有指示。”^⑮1947年1月25日,中共冀热辽区党委生产会议提出,今年大生产的中心任务是组织起来,大量增加农业产量与发展纺织,以保障农民吃穿问题。增加农业产量的主要方法是,普遍发展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进行精耕细作。在冀东现有的生产基础上,精耕细作主要包括:(1)耕作要及时;(2)多加人工;(3)多施肥;(4)改良土壤与作物(变旱地为水地、园地,修梯田、挖井、开渠及防止水患,多种麦、棉等)。^⑯

①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辑》,第218页。

②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辑》,第231页。

③ 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89页。

④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173页。

⑤ 潘运明:《从蹙将到将军》,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年版,第238页。

⑥ 孙晓忠、高明编:《延安乡村建设资料》第3册,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⑦ 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编印:《晋察冀人民翻身记》,1982年印行,第129—130页。

⑧ 《棉产超过往年百分之三十》,《人民日报》1946年9月23日,第2版。

⑨ 《周文文集》第4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⑩ 《人民日报》1947年1月13日,第3版。

⑪ 新疆军区编:《屯垦军魂:抗日时期三五九旅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解放初期驻疆人民解放军大生产运动纪实》,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⑫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辑》,第347页。

⑬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辑》,第277页。

⑭ 《薛暮桥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页。

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

⑯ 晋察冀边区《边政导报》第7卷第5期,转引自宋劭文《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资料选编》第1辑,第801页。

三、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精耕细作的内涵

很显然，“精耕细作”是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对农业生产中“吴满有式的勤劳与得法”的概括。在吴满有之前，中国农业已有悠久的精耕细作传统。这个传统在夏、商、西周、春秋时期萌芽，在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成型，在隋、唐、宋、辽、金、元时期扩展，而在明、清时期继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这个传统都包含有哪些方面的内容？古代虽然没有“精耕细作”一语，但古人也试图对于农业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如，明代将领戚继光在阐述练兵的道理时说：

譬如农夫种田，春则勤耕，下种以时，粪多力勤，夏耘不失，秋乃有获。尚有时、虫灾、水旱未卜。若有美田，春仅下种，不耕不耘，不粪不力，到秋来也要与他农同获粮粟，有此理否？^①

明末《沈氏农书》有言：“凡种田总不出‘粪多力勤’四字。”^②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有学者做过或狭窄或宽泛的解释。万国鼎认为，

精耕细作一般是指作物在栽培过程中，从整地到收获所做的一系列的细致周到的技术措施，育种、改良土壤和改革工具等，属于基本建设性质，不在上述过程的范围内，但也很难截然划分，一般需要这些基本建设来帮助做好精耕细作，有时甚至基本建设直接成为精耕细作的组成部分。^③

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学者就利用和改造土壤，用地养地、使地力常新壮，抗旱保墒和合理用水，合理施肥、用粪犹用药，培育良种和种子处理，精细的田间管理等几方面，对精耕细作的内涵作了初步的探讨。^④李根蟠则视精耕细作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综合技术体系。这个技术体系的中心或基础是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一系列技术措施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⑤农业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其本质就是利用土地进行动、植物生产。因此，如何使既有土地上生产出足够多的为人所需要的产品，就是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时所要考虑的问题。“精耕细作”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提提高产量，解决吃饭问题。

中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为了提高产量，先民们总是想尽各种办法，进行精耕细作。那么，在“精耕细作”这一成语形成的时候，人们心目中所指的精耕细作又是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这需要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加以考察。

在面临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所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就是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既然“精耕细作”是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对农业生产中“吴满有式的勤劳与得法”的概括，那么，精耕细作内涵首先体现在吴满有的身上。用吴满有自己的话说：“咱的庄稼做得细致些，他们都说咱会生产。”^⑥根据《解放日报》等媒体对吴满有的报道，吴满有的精耕细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勤于耕作。吴满有认定，“地，只要你舍力，总是会多打粮食的。”^⑦所以“肯劳动”就是他的成功秘诀。《解放日报》在对吴满有的首篇报道中，借用同村农民的话称赞吴满有的勤劳：

第一，他起身比谁都早，睡觉比谁都晚，天还没有亮，就喂牛上山，天黑了，才从地里回来，真能受苦；第二，冬天没啥事做的时候，勤于捡粪，自己又会养羊养牛，肥料比人家多，每垧地平均要上七驮粪；第三，庄稼出了苗的时候，有的农人怕上山，不锄草，或者最多锄一次，他却至少锄

① [明]戚继光撰：《练兵实纪》，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80页。

② 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第29页。

③ 万国鼎：《中国农业精耕细作传统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新华日报》1961年7月22日，第3版。

④ 华北农业大学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组：《精耕细作——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优良传统（一）》，《中国农业科学》1978年第1期。

⑤ 李根蟠：《精耕细作三题》，《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年第4期。

⑥ 张仙洲：《我是劳动英雄》，《申报》1948年7月3日，第5版。

⑦ 张仙洲：《我是劳动英雄》，《申报》1948年7月3日，第5版。

二次,谷子自然就长得旺;第四,地耕得深,别个农民耩土一般五寸深,他却至少七寸深;第五,打土的时候,一定打得很碎,不马虎;第六,耕地下种,都很适时,不早也不晚。因为他有这些优点,所以每垧地最高收获量老斗一石二斗,最低收获量也有老斗四斗(等于市斗六斗),均扯每垧地要打粮老斗六斗(合九市斗),别个农夫每垧地平均只收粮老斗五斗(合市斗七斗半)。从平均的收获量来看,他比别人多打粮六分之一。^①

诗人艾青是这样写吴满有勤耕种的:

……

你耕地耕得深,
打土打得烂,
上粪上得多,
锄草锄得勤;
你的庄稼,
比谁也种得好……^②

为了写吴满有,艾青说:“我把我写的《吴满有》拿出来念给他听——这是我找他的目的。我坐在他身边,慢慢的,一句一句,向着他的耳朵念下去,一边从他的表情来观察他接受的程度,以便随时记下来加以修改。”^③显然,诗中内容是得到吴满有认可的。

其次,经营得法。吴满有不仅是勤快,“肯劳动”,而且他经营得法。吴家不仅种植谷子、糜子等粮食作物,还经营副业,养牛养羊,还种植林木、果树等。他对于要开多少荒地,要用工多少个,谷子种多少,糜子种多少,麦子种多少,其他杂粮种多少,耕锄多少次,深度是几寸,上粪多少袋,种树多少株,每种作物的产量是多少,一头肥猪的价钱值多少,每项农活什么时候结束,乃至作物播种的早晚、牲畜疾病的预防等等,都心中有数。他善于精打细算,把农业与工副业结合起来,利用市场经济来安排农业生产。“因为会养羊养牛,肥料也就比人家多”;他也会“种柳树编筐子”。1943年,他“计划种棉花一亩,因为没找到棉籽未种。”但这没有影响到他家的生计,“穿布和一切零用,因为家离延安市近,谷草容易卖,卖谷草的钱就足够了。”养牲口除了可以提供肉食外,还可以积肥、卖钱、从事运输,甚至入股。1943年,原计划抽三头牛运一次盐,后来本乡自己成立了一个运输队,吴满有拿一头驴作价1万元入股,听说已经运了12次盐,每一元股本可以分到八九元的红利,原计划入股南区合作社2000元,结果入了2万元。1944年,他又计划入股南区合作社2万元。在运输队再加入一个骡子长年运盐(连原有共两个牲口)。

最后,计划周密。吴满有不仅勤快,会经营,而且会计划,样样都想得很周到,这在一般农民中是难能可贵的。为了推广吴满有经验,1943年1月8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以“劳动英雄吴满有”为题,报道了吴满有开荒、劳动力和耕牛使用的配备、副业和植树几项计划。这些计划细致入微,连种什么树、种多少棵都做了安排。对此,《解放日报》作了这样的评价,“我们看,八日本报发表他所拟定的今年生产计划,内容是多么具体,多么周密。整个计划有中心,本年要多收粮食十余石;劳动力与耕牛的配备,都很恰当,连弟媳妇与儿媳妇的工作也照顾到了;时间抓得特别紧,如‘旧历七月放青时,抽三头牛到张家畔驮盐一次’。这样的计划是既有眼光,又合乎实际的。”《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9日第1版又将吴满有1944年的生产计划悉数列出。在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吴满有又重新订了他1944年的生产计划。这个计划把人力、畜力、财力等都作了细致的安排。如,“雇一个长工,

① 《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影响群众积极春耕》,《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第1版。

② 艾青:《吴满有》,《解放日报》1943年3月9日,第4版。

③ 艾青:《吴满有,附记》,《解放日报》1943年3月9日,第4版。

一个拦羊娃,半个拦牛娃,安一个伙子。”“三个婆姨,两个做饭、养猪、喂牲口、抚育娃娃,一个纺线。”^①

“吴满有式的勤劳与得法”,也是当时劳动英雄们的共同经验。1943年在宣传吴满有的同时,一对父女也受到宣传。“父名马丕恩,女名马杏儿。二人去年种地五十三垧,即一百五十九亩,因耕作得法适时、勤锄、深耕、细密,及全家配合劳动等关系,去年实收粗粮四十二石,……较该地其他庄户的平均收获量多收获四分之一。”^②“精耕细作”就是对“耕作得法适时、勤锄、深耕、细密,及全家配合劳动等”的高度总结。

四、精耕细作的技术要点及棉花的精耕细作

(一) 精耕细作的技术要点

吴满有的勤劳、得法和周到,最终都必须落实到农业技术措施上。吴满有的经验和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开展吴满有运动,及在生产中所采取的各种技术措施,自然也就构成了精耕细作的内涵。

在“精耕细作”一词未出现之前,与精耕细作相关的内容多统称为“深耕”。近人也用“深耕”来翻译西文(intensive cultivating),而与“广耕”(extensive cultivating)相对。^③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深耕”是“改良作法”或“改进农作法”的代名词。为什么要改进农作法?改进后的农作法与改进前的农作法有何不同?根据1942年对绥德、米脂耕作技术的调查,“为了防止遭受灾害时,作物全部损失,农民多采用‘带田’耕作制(间作方法)。轮作方法之利亦为农民所了解,当地称为‘掉茬’。这样可使地力之消耗、发挥得到调剂与休息。”主要作物的耕作大都经过下列几个步骤:(1)整地——在播种之前将地犁一遍,抹一遍,耙一遍。其时间,冬麦在大暑前后,其他谷物在春分前后。因畜力不足很少耕两次,没有采用深耕方法。(2)播种、施肥——选种尚不为农民所注意,多由上年收获中留下今年新种。播种方法有撒播、条播、点播三种。(3)中耕(锄草)——所用锄有大小两种,中耕次数如表1所示。

表1 边区主要作物中耕次数表 单位:次

作物种类	谷	糜	高粱	豆子	豆子	大麦	麦	洋芋	麻
土地类型	山地	川地	山川地	山地	川地	水地	山地	山地	水地
中耕次数	2—3	3—4	2—3 3—4	2—3	3—4	4—5	1	2—3	2—3

资料来源: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第25页。

普通中耕次数虽如上述,但是如农民所说“锄地能抵三分雨”,“春地要耕,秋地要锄”。“在下雨后二三天,有时间,农民总要加锄一次。绥、米地里很少发见杂草,农民对于锄地是极为注意的。”^④

所谓精耕细作的改良作法就是在原有整地、播种、施肥及中耕等等的步骤上多下功夫,同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步骤。吴满有的经验是:

整地强调深耕。别的农户一般都是犏土五寸深,他却至少六七寸深。“1943年,二月初五就开始耕土地,杂田翻过两次,……耕地约深六寸,因为牛犍好,比一般老百姓能深耕一寸。土圪塔都打过了。不同地形地势的农地有不同的耕作方法和农具。”吴满有说:“圪梁平地揭个快,立地掏个快。”^⑤“揭”是耕地的意思,平地和黄土梁上的农田,用犁耕效率高,“立地”就是坡地(一般指坡度比较大的,不便于犁耕),“掏”就是用镢头刨地,坡地用镢头刨比较容易。^⑥

① 《吴满有和吴家枣园》,《解放日报》1944年1月1日,第2版。

② 《马氏父女生产卓著,一年劳动两年余粮,移民生活迅速改善的榜样》,《解放日报》1943年2月11日,第1版。

③ 行巽:《东欧农业》,《申报》1922年12月31日,第19版。

④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10—12页。

⑤ 向继东主编:《文史茶座》,北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

⑥ 2016年7月10日,刘壮壮QQ聊天告知。在此申谢。

施肥讲究多粪。1942年,每垧地下粪7袋,1943年下粪10袋。因为会养羊养牛,肥料也就比人家多。1943年,上粪的熟地50多垧(麦地在内),每垧上粪12袋。1944年,除荒地和二茬地外,都上粪,每垧上20袋。

播种要求适时。耕地下种都很适时,不早也不晚,譬如谷子要在谷雨前、糜子要在芒种前下种完毕。要根据土壤、作物品种、物候等因素来确定播种期。1944年3月,吴满有来到八路军三五九旅,与垦荒屯田战士们交流农业生产经验。吴满有说:“熟地撒下籽儿就翻,荒地掏过再撒,籽儿可要选得关,红糜子日月小,黄糜子日月大,大小日月不能搀在一搭种;红谷子黄谷子也得清一色,混堂籽儿不好留。”又说:“这搭地气阴,籽儿下迟些更保险。谷子清明后,杂田看杜梨开花。”^①

中耕力争多锄。他的谷子锄草三次,糜子锄草两次;大块土圪塔,都要打得粉碎,毫不马虎。1943年,旧历五月初六开始锄草,计谷子锄了二次,小部分锄了三次,糜子锄了两次,杂田、瓜菜、麦地共用工约一百二十个。到七月十五日锄完,地没有荒的。1944年,锄草荒地二次,熟地三次。

吴满有在水旱灾害和牲畜疾病防治方面也有自己的经验。他注重农田开沟排水。1943年,除了荒地和二茬地之外都拨了水壕。1944年,三十垧地要新拨水壕。同时他注重蓄积雨水,防止干旱。吴满有说:“渠渠湾湾梢把砍了好,再搞个水坝子又能防水冲。”^②他的羊和牛养得最好,经常对拦羊娃讲一些畜牧知识,譬如栏圈平时潮湿一块就得垫好一块,每日要吃饱草,喝饱水,草要扎得短,筛得净,不让有砂土和鸡毛,放出外边不让在潮湿地下卧,免得生病。

吴满有的经验,经总结、宣传和报道之后,使精耕细作的内容不断充实。1943年边区改进农作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秋翻地,深耕地,磨地,多施肥,多锄草,修水漫地,修埝地,挖水窖,筑水坝,拍畔溜崖……棉花方面,则精选种,勤打卡,增产了棉花。”^③

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在《陕甘宁边区改良农作问题》中,虽然使用的是“深耕细锄”和“深耕细作”,但却对边区群众的精耕细作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文中将边区改良农作方法的具体措施划分为:深耕、施肥和积粪、锄草、选种及修改地形等方面。在强调多粪、多锄的同时,特别重视“深耕”和修改地形。深耕是改良农作的首务,要求多耕,犁得深,以及细耕、细磨、细打。修改地形则除修水地、水漫地、埝地等外,还包括修埝地(梯田)、溜崖、拍畔、拨水壕、打水窖、打坝堰等项作业。^④

1944年,晋绥边区评选“精耕细作劳动英雄”,条件包括:(1)多耕精耕多锄细锄;(2)多上粪上好粪;(3)修埝溜畔挖水窖,勤拨水道;(4)防治虫害有经验,对技术有改进者。^⑤首次将防治虫害加入到精耕细作的内容当中。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在对1944年上半年生产初步总结(1944年7月)中专门提到精耕细作情况,即“一镩一犁毫不苟且,拾粪送粪效率惊人”,“无论旧地新开荒,大部分都多翻了一次,使得土质疏松,就能保存水分多受日光,又犁又耙,草根大部除净。刨埝畔多上粪,按时耕种下籽匀,春季打下好基础,夏锄时锄好。”具体内容包括:多上粪、斩谷茬、精开荒、翻压茬地、刨埝畔、精耕种。其中,刨埝畔(即拍畔溜崖,或修埝溜畔)就似乎是吴满有经验中未曾提及的。这项措施可使下边的地增加了肥料,上边的地也再不被野草“胁”地,圪狸也吃不上庄稼。^⑥强调修埝溜畔有防止

① 向继东主编:《文史茶座》,第154页。

② 向继东主编:《文史茶座》,第154页。

③ 《1943年财经工作的全面检讨与今后工作方针》,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藏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第187页。

④ 中共西北局调查研究室:《陕甘宁边区改良农作问题》,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65—67页。

⑤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藏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173页。

⑥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藏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2页。

水土流失、除草灭害、增肥的功能。作为今后的任务与方向,精耕细作又包括:(1)锄草:发动群众多锄草,一般庄稼最少要锄三次;(2)秋翻地:变工组须全部翻过,有变工的村子争取全部翻过,没有组织起来的村子,争取三分之二翻过;(3)积肥:沤绿肥,垫圈,修人茅厕与驴茅厕,拾粪运动与清洁卫生运动联系,争取每垧增上粪一驮;(4)修坝、溜畔、挖水窖;(5)选种:注意地里选种;(6)防治病害:各地注意研究防治方法。一般地区要在锄草积肥秋翻地等方面多下功夫,特殊地区如临南离石一带,更要注意修崖、溜畔、作水窖与下种等农作法,多上粪的地区更配合上地药(砒霜黑矾),防治病害。此外,对精耕细作也提出了具体的增产要求:水地每亩粗粮1斗;旱平地每亩粗粮5升;梁地每亩粗粮2升。^①

精耕细作提高技术成为增产的保证,这在位于晋冀鲁豫边区的黎城县1946年的生产实践中得到证实。该县成立了137个技术研究会,组织农民在锄苗、施肥积肥、翻地、棉田管理、秋耕、选种等环节上下功夫。施肥方面,在多上肥的同时,强调因土施肥。背坡地上骡马肥好,阳地上圈肥好,棉花地上灰肥最好,荒肥上红土好,并组织熏荒大量积肥。春耕方面,提出垡地宜深,翻地宜浅。棉田耕种方面,强调多耙多犁,用耧挑垡,撒里种好捉苗。棉花移栽则采用“带上棉苗的本身土,阴地苗移到阴地,阳地苗移到阳地”的办法,提高移栽成活率。在播种期的选择上,研究种谷先种阳后种背,因阳地向阳快干,背坡地养垡(墒)。在耙地上,创造了比旧耙的刺儿多的梳耙,前后刺儿钉错开,耙一耙顶旧耙两耙。又创造了又快又便利的小耙,牲口也能用。在锄苗方面,认识到锄苗的好处:一是能松土去草,以后改茬地没草;二是土壤松了宜通风吸收日光,下雨能保存水分。各村组织锄麦运动。推广小锄拔苗的方式。有的谷子和玉茭(米)锄过三、四次。在选种上推广了耐旱抗风的169小麦,并使用温汤浸种、盐水浸种和石灰水消毒等办法。对玉米的选种注意选粗壮没有病虫害的,不倒的、穗子不下垂的,进行穗选时做到剪头去尾。选择谷种时,选最适合本地风土的,穗大、籽饱、满码儿、籽紧、没有病虫害的。在秋耕土地上,要求一方面耕好地,一方面能经理好牲口爱护畜力。另外,秋耕普遍采用不耨,既保垡(墒)又杀虫,这已成黎城的秋种习惯。^②

在精耕细作的众多环节中,黎城县选择在犁、锄、上粪等环节多下功夫,所以又成为重点报道的对象,如黎城车元村,1946年所有的地每亩平均上粪45驮,普遍作物锄了三遍,“金皇后”玉茭锄了四遍,棉花锄了六遍。^③黎城平顺“普遍作到犁、锄三遍,每亩地上肥三十至一百担。加上技术的提高,选种浸种,减免了虫害损失。”^④

由于采取了上述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该县在当年的大生产运动中,农业增产142364.8石。^⑤同一年,王屋县群众在精耕细作方面,秋地每亩上粪80担,棉田每亩上粪90担,全县麦全锄一遍(过去即不锄),棉花已锄过两遍。另外在农暇修复济(源)垣(曲)公路18里,使七百余户农家可以用车运送粪土,全年可节省1万工,用于精耕细作。^⑥也是为了贯彻精耕细作,太行各地紧张锄苗,垣曲全县3万人卷入锄苗运动。^⑦山东解放区由于努力开荒、兴修水利、精耕细作,小麦产量大大超过往年。^⑧总之,在这一年的农业生产中,全边区都作到多耕多锄,精耕细作。在太行、太岳某些地区已作到耕

①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546页。

② 《黎城联合办公室增产的保证 精耕细作提高技术》,《人民日报》1946年11月12日,第2版。

③ 刘己未、刘琳、胡绍元:《精耕细作经营副业种植特种作物 车元村达到耕二余一 订出冬季生产计划争取做到耕一余一》,《人民日报》1946年11月2日,第2版。

④ 王巨林:《黎城平顺均达耕三余一,共增产细粮三十四万石》,《人民日报》1946年11月12日,第2版。

⑤ 《黎城联合办公室增产的保证 精耕细作提高技术》,《人民日报》1946年11月12日,第2版。

⑥ 《王屋群众翻身后积极生产互助组织扩大十五倍》,《人民日报》1946年7月21日,第2版。

⑦ 《贯彻精耕细作保证耕三余一 太行各地紧张锄苗 垣曲全县三万人卷入锄苗运动》,《人民日报》1946年7月24日,第2版。

⑧ 《山东解放区生产有成绩》,《人民日报》1946年8月4日,第2版。

三余一。就以耕作细致的种棉来说,过去种棉不习惯的太行全区,1946年计划种100万亩,结果种到150万亩。太岳全区也种棉70余万亩。冀鲁豫特别是冀南为数更大。据初步材料统计,全边区种棉业达800余万亩。^①因此,当年的《人民日报》做了相关报道。^②

(二)棉花的精耕细作

“精耕细作”一词不仅用于粮食生产,也用于棉花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1943年,吴满有计划种棉花一亩,但由于缺乏种子,没有实现。因此,在吴满有这里没有可供直接借鉴的棉花种植经验。但精耕细作同样适用于棉花生产。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便已将“精耕细作”当作是今后边区植棉的推广方向,“对东三县及个别乡区棉地面积已发展到足够程度的,应停止扩大面积,完全实行精耕细作。在必须扩大面积的区域,应做到与精耕细作并进。”^③

1944年2月,边区政府提出要“实行深耕细作,提高植棉技术”。深耕细作的办法,应主要包括以下各项:选地、选种、入种前至少要翻两次,耨两次,每垧要上粪至少三十袋,并在翻地前有部分粪送到地里,以便早翻入地内充分腐烂。至少锄五次,打卡五次,并要锄得合时,打得合时。泡种。挑水种棉。^④后来精耕细作的棉花种植又包括了这样的一些内容:首先是选择气候、土壤适宜棉花生长的地区。其次是了解怎样种棉花,包括选种、翻地、上粪、准备种籽(种籽处理,冷水泡、温水泡、煎水浆、煎水浆冷水救)、下种、棉田管理(棉花最少要锄五次,打卡、收花,虫害防治)等详细的技术环节。^⑤有时候病虫害防治并不包括在精耕细作之内。“如果我们今年仅作到深耕细作多上粪,但对作物的病害、虫害没有进行防范和及时的医治扑灭,那末深耕细作会白费了力气,所以需要像防疫似的加以注意,并要创造防治的有效办法。”^⑥

在1946年的黎城,由于全县除四区、二区一部分地区种棉较有经验外,其他大部分地区在种棉经验上是欠缺的,所以对棉花的精耕细作反而更加重视。在施肥上,研究出棉花地上灰肥最好。整地上强调多肥多犁,用耩挑垧。移栽上为了提高成活率,采用“带上棉苗的本身土,阴地苗移到阴地,阳地苗移到阳地”的办法。在棉花整枝方面(即打卡,修理棉花运动),则加强了对棉花“打杈、打顶、打油条、脱裤子”的技术指导。^⑦

五、毛泽东、吴满有和精耕细作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号召开整风运动。配合整风运动,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的《解放日报》进行了改版。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了八个大字:“深入群众,不尚空谈”。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当地群众运动和生活,经常在党报上反映,并须登在显著的重要的地位”。^⑧1942年4月1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决心,“密切地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不仅要充实群众

① 荣一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主席谈边区一年来的和平建设》,《人民日报》1946年8月10日,第2版。

② 《风调雨顺精耕细作,各解放区同庆丰收》,《人民日报》1946年8月25日,第2版。

③ 《植棉问题》(1948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第600页。

④ 高自立:《边区植棉发展概况及今后推广方向》(1944年2月10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第601页。

⑤ 《植棉问题》(1948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第601—610页。

⑥ 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编:《边区改良农作问题》(1944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第744页。

⑦ 《黎城联合办公室增产的保证 精耕细作提高技术》,《人民日报》1946年11月12日,第2版。

⑧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

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引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① 吴满有就此进入了《解放日报》的视线。

《解放日报》对吴满有事迹的报道,引起广泛的关注,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吴满有与毛泽东同庚,都是 1893 年生人。吴满有成了毛泽东了解边区农村情况的农民朋友。毛泽东亲笔为他题词:“天下有名”。美国记者冈瑟·斯坦曾写道:“吴满有的名字在延安尽人皆知。……毛泽东说他在促进农业生产方面贡献极大,由于农业的发展,才使边区挫败国民党以封锁来饿死边区人民的企图。”^② 在回答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吴满有说:“我和毛泽东同志一道开会。我们还单独作过长谈。我还和他一起吃过好几次饭。”^③ 1946 年春节后,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特意指定吴满有担任毛岸英的农业大学的老师,让后者跟随吴满有学习种地。

从 1946 年开始,“精耕细作”一词就非常流行了。从当年 6 月 15 日到 11 月 12 日的仅 5 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用到“精耕细作”一词就有 19 次之多,每月约 4 次。这个频率超出从 1946 年 6 月至 2012 年 12 月的 786 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相关文件资料 2 052 篇中,平均每个月 2.6 次的频率。

吴满有是毛泽东树立起来的典型,他所代表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以及农业生产中的“精耕细作”方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 1957 年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共产党准备开展新的大生产运动——农业大跃进时,自然又想起了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最响亮的口号“靠精耕细作吃饭”。“精耕细作”这一成语也从此更加深入人心。

六、结语

本文采用“概念史”的方法,对“精耕细作”这一提法的出现进行了梳理,得出如下结论:

1. 中国有着悠久的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这一传统在实践中代代相传。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最精准的概括莫过于“粪多力勤”。吴满有是 20 世纪 40 年代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涌现出的劳动英雄的代表。“精耕细作”的提法是在宣传吴满有等劳动英雄过程中对吴满有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并且在动员和组织大生产过程中逐渐流行起来的。

2. 精耕细作主要是针对人多地少地区已垦土地提出来的,主要是着眼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最初的提法是“深耕”,后来“深耕”又与“多锄”“多粪”等,统称为“改良作法”,再后来出现了“深耕细锄”“深耕细作”的说法,最后在 1943 年时受到国民政府宣传的影响,定型为“精耕细作”,并一度与“深耕细作”交替使用。

3. 精耕细作在出现时期主要指的是大田耕作,从吴满有的经验来看,主要表现在深耕、多粪、耕种适时、多锄,以及防灾除害等方面。这些经验经推广后,又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发展,又加上了修垆、溜畔等内容。这些技术措施主要针对粮食作物生产,后来也在棉花生产上得到运用。它着眼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不涉及复种等集约生产等技术。

4. 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流行起来的“精耕细作”一词,成为中共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和宣传口号。毛泽东与吴满有的交往也强化了这一词语在中共领导人心目中的印象。因此,当 1957 年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共产党准备开展新的大生产运动时,自然又想起了流行已久的口号“精耕细作”。

5. “精耕细作”这一提法的出现,经过了“深耕—深耕细锄—精耕—深耕细作—精耕细作”的过程。其意义也从最初的粮食作物生产,发展到棉花生产和畜牧业生产,从农业领域延伸到各行各业。但凡认真细致做事,都可以称为“精耕细作”。

① 《致读者》,《解放日报》1942 年 4 月 1 日,第 1 版。

② G.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 157.

③ G.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 161.

A Slogan and It's Story: The Making of the Idiom of *Jinggengxizuo* (Intensive Cultivation)

Zeng Xiongsheng

Abstract: Jing Geng Xi Zuo (精耕细作, Intensive cultivation) is a Chinese idiom that generalize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China. This feature has remained in the practice of peasant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since it was form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However, as an idiom, it began to get popular after the 1940s, and its formation coincided with that of the Yan'an Large production movement that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liberated area, especially with the typical labor hero Wu Manyou and other exemplary characters that established in the movement. Wu Manyou and the others had increased production by improving farming practices to support the border area construction, after the media reports, his experience was summed up as "deep-plowing and meticulous hoeing", and finally stereotyped as "Intensive cultivation" at the end of 1943 and 1944,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ords "fine tillage" that introduced from the Kuomintang area, and in 1957 after Mao Zedong's mention again, it receives the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becomes the New China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guiding ideology. It has been used and affected beyond agriculture. Combin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is idiom, with the mythology of concept archaeology, this paper combs the intension of intensive cultivation,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otton production. In order to have a more in-depth and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is idiom that people often speak of.

Key Words: Intensive Cultivation; Yan'an Large Production Movement; Wu Manyou; Mao Zedong; Great Leap Forward

(责任编辑:王姣娜)